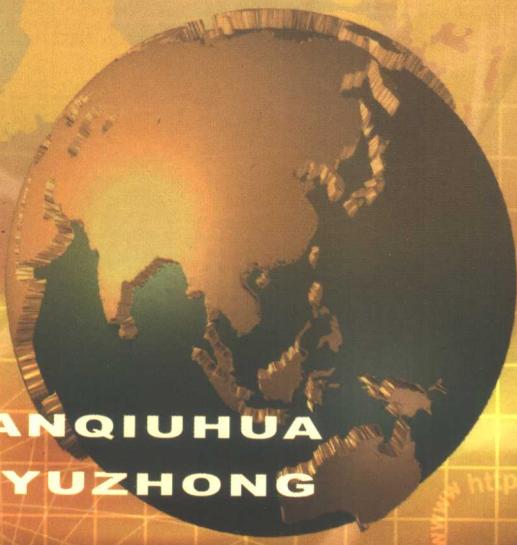


汪国培·著

全球化视域中的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



QUANQIUHUA
SHIYUZHONG
DE
GAOXIAO
YISHI XINGTAIJIAOYU



全球化视域中的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

汪国培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视域中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 / 汪国培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978-7-81090-795-8

I. 全… II. 汪… III.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IV. G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838 号

全球化视域中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

汪国培 著

责任编辑 康敬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西门外 邮编：212300)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 字数 225 千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090-795-8 定价：1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序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会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的加大,如何积极研究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择“全球化视域中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显示了其敏锐的理论眼光。他提出的一些富有创意的见解,不仅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理论性、现实性、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课题,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凸显。从理论的视角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两大内在关系,即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与阶级意识的关系,这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而其聚集点就是“意识形态教育”;从现实的视角来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是普遍感受到而又不同程度存在着困惑,其历史背景的“源头”就在“全球化”使理论的“紧张”状态转化为实践上的“困境”;从政策层面上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不仅关系到政局的稳定、更关系到几代人的政治选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展开有理论深度的对策性研究。



作者长期从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阅读了大量理论著作和学术研究成果,表现出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较大的学术发展潜力。特别是他在写作过程中能紧紧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准确定位问题和在当今十分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如何提高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问题,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和方法,采用了大量实证调研分析,对全球化背景作了全方位的透视,对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和严肃的思考,明确提出高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既要理直气壮,又要注意克服泛政治化倾向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并着力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体系、实践体系、话语权、环境和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和探讨,对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和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构建等均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实践之树常青,科学研究永无止境。我衷心希望作者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在今后的工作和学术道路上深入探索,为进一步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教育的规律作出不懈的努力。

王小锡

2006年12月12日



前　　言

—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无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图景，揭示了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始自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运作和扩张的过程。虽然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文献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准确地指明而且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所有现象，但却已揭示出全球化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定会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今天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这一过程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达到了高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就日益成为世

[1]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6 - 30



世界各国的一个时髦术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都纷纷在谈论和研究这个话题。大家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样也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改革开放的中国同样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

全球化对国际体系的变革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认同，影响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和世界生产的调整，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逐渐增强，加强了各国的对话、交流和合作，缓和了以往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对抗状态，有利于消除各国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带来了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主导着世界经济秩序，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干涉以谋求经济霸权，强行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和平演变。因此，如何全面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的既矛盾运动又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构筑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精神面貌等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可以说，任何社会都必须选择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



思想体系,作为支撑社会稳定与进步的精神支柱,作为构建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问题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政治学范畴,还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在这里我们更多地是从政治社会学的意义来论述意识形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从而也反映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最重要的有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形式”。^[1]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而且,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不同的,只要社会条件改变了,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基础和行为改变了,反映这些条件和利益、指导行为的意识形态也会随之调整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宏观高度,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提出了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客观性和必要性的命题。他们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因而,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观时,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

[1] 肖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369, 37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8



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2]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抗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且在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还相当强大的历史条件下，思想领域内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较量。在这样的形势面前，社会主义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坚持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可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使高校师生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等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策略，他们利用种种现代传媒手段，向高校青年教师和学生传输其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在这种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人在对待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价值取向上，重现实功利、轻理想信念，重报酬与实惠、轻奉献与责任，重个性绝对自由、轻纪律规范约束；在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片面强调所谓“客观”、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9



“中立”；在课堂教学特别是文科教学中，或疏远政治，或哗众取宠，或偏离正确方向，等等。如果我们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放松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那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就必然会乘虚而入，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种种因素的影响，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遗失了应有的学科性，忽视了或人为地淡化了用政治教育取代德育的历史尴尬局面和用单一的德育代替系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误区。意识形态教育遗失了应有的学科性也就失却了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以此为背景的大学德育的学科地位也不断受到质疑。与时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手段、方法都经历着由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复杂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为迅速地扩展着，并对人的生存和需要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强大的经济竞争和物质诱惑下，许多人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缺乏关照，对物质利益的单一追求并没有减轻其沉重的精神负担，反而成为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病，如人格商品化、精神分裂病、实用主义等等。人们的心灵困惑与精神忧虑日益严重，这无疑是过于强调外在规范、忽视内在信仰的结果，也客观上反衬出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手段相对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得人们在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中，更多地依赖作为低水平社会意识的社会心理，而作为高水平意识形态的人格自觉、自律作用和意识支撑作用却没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社会地位受到了挑战。具体表现在：

一是意识形态教育过程的实践性不足。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其教育内容的源泉和立足点是生活实践，是实践的产物，离开了生动而丰富的实践生活，其内容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就无从获得。当前，虽然我们已经建构了一个趋于开放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但在实践的现有层面上，理论的作用仍然很大程



度地停留在理论状态。现有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在内容设置上普遍存在着重宏观层面、轻微观生活的倾向,对原则性的、战略性的東西研究较多,对微观操作和生活实践则关注较少,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内在需求尚存在一定距离,缺乏应用性和可接受性,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能自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社会,不能正确运用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指导人生。

二是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的深刻性不够。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教育的价值已经得到了确认,但明确其价值、有什么价值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认可感受并作为主体积极地实现其价值,主体自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现有教育内容的深刻性不足所致。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物质转化理论等都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了意识形态教育的价值,改革开放的实践又从事实层面上展示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建设的巨大作用。但是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教育内容更多地是停留在解释理论文本和学科的状态和层次上,没有把实践的成果很好地丰富到现有教育内容之中,意识形态教育应有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三是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不强。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已经注意到主导性和多样性、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但在实际教育中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方面过分强调教育内容的可测性,忽视了对教育内容理解、思维、态度等高级认识过程的培养,使得意识形态教育要么是“曲高和寡”,要么是“志短言轻”,始终徘徊于理论与实践的疏离而导致应为与难为的困境;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工具化的知识观和社会效用标准,使意识形态教育扮演着社会适应及社会控制手段的角色,而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改造及重建贡献不足。这样使意识形态教育处于有教无育或是工具化的状态,其负面影响决不是仅仅在于固化、合理化社会时尚价值取向,而更为严重的是陷入对年轻一代一时兴致和眼前利益的

迎合,从而陷入肤浅的甚至轻浮的“生活适应理论”,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的期望和精神寄托的失落。

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一些人对意识形态教育采取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回避和漠视的态度,使本应根植于、从属于意识形态的思想、道德建设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其曾经怎样的轰动,却仍难逃被冷落的厄运。这种情况使那些从事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人们普遍感到困惑和无奈。因此,关于意识形态教育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时代的精神状况,关系到现实社会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到它所构成的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和社会有机体的稳定,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

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客观趋势是以开放、互动、交流为基本特征的,它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接触、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基础的平台。我们在面临全球化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带来的冲击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同样为我们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创造了新的机遇。首先,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意识形态交流和对抗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在全球化平台上,不同的意识形态总在向人们展示其优越性和吸引力,企图以最美好的面貌吸引和争夺青年一代。意识形态是以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平台上展示了独特的品格和内涵,对青年一代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增强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次,全球化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了丰富时代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开放的体



系,它能够包容和吸纳一切社会形态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时,必须依托时代背景,吸收新的理论来发展、丰富、完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依托丰富多彩的时代和日新月异的生活实践,重塑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形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创造力、竞争力和对群众的吸引力。再次,全球化中多元意识形态的并存、交流与对抗,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有利于意识形态教育的创新。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全球化进程中广泛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我们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审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问题,使我们看到传统和现代的差距,找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从而建设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继承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体系。

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过程在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制度以新的形式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因此,它必然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解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根本性质。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或从今日全球化的事·实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看起来是趋于和缓,实质上是在和缓的背后更加意识形态化了。这使得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尖锐,使人们不得不去加以关注和重新审视。为此,中央十分重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特别是2005年1月1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学生,引导青年学生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批判、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



强,如何弘扬主旋律,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何积极主动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准确把握当前学生思想、生活、学习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所有这些都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如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深入挖掘、普及和发挥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作用,解决意识形态教育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加强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科学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实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化、系统化、现代化,是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

从国内学术界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这个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一直处于十分活跃的局面。在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国内学者的研究偏重于对国外意识形态研究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主要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加上国内一些哲学研究刊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译介,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评介性研究,主要是针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评介性研究,并就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中的热点问题进行评介。通过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学术界形成了研究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高潮。进入 90 年代,我国



理论界一些专家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又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为创立独立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特别是对意识形态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意识形态和关系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面对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国内理论界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重点又转到了对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的研究上来,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但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就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挑战和对策方面进行的研究,在学校意识形态教育方面也出版了一些介绍国外意识形态教育和中西方学校意识形态教育比较,以及关于意识形态教育学、课程学等方面的著作,如《意识形态与课程》^[1]、《美国人的道德教育》^[2]等。从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研究情况来看,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文章来全面阐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研究成果,即使是有一些文章,也只是侧重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一般的层面的研究,譬如关于高校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WTO与高校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等研究,而对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内涵、目标、任务、路径和评价体系等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较少。

因此,本书拟在深入调研、切实分析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新问题和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深入比较借鉴中外意识形态教育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科学的方法为基点,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为依托,重点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

[1] 阿普尔. 上海: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 美 R. 赫斯利普.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着眼于探讨加强和改进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构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模式,从而为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建议。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践性研究并重的路径,一方面是利用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在理论上予以分析、提炼;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作者长期从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优势和积累的经验、体会,采取实证研究的方式,就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调研,在获得具有真实性、普遍性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达到逻辑演绎和实证研究的结合。具体来说,要通过研究达到以下三个目标:

一是深入科学分析。全面、准确、科学地判定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特别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现状,科学地分析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来说明当今时代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是新时期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首要之义。

二是作出理论应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意识形态教育问题的有关论述进行提炼和分析,找出其历史线索,为我们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提供最基本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依据。同时,在深入研究、较为全面地理解、消化全球化理论和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解答,以科学的理论来指导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研究工作。

三是进行实践探索。通过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现实的分析、调查,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导和分析,再从这些社会现实的



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提出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若干基本方法和原则,对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的要题、难题进行分析研究。最终通过实证调查和理论解答,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来探索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问题,着力在内容体系、实践体系、话语权建设、环境建设和评价体系建设等五大方面进行探索,以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动态管理系统,着力构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长效机制。

本书共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全球化与意识形态;第二,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及其面临的挑战;第三,国外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与启示;第四,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和任务;第五,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路径选择。